

# 金进《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

## 拨开历史迷雾的探索

□白杨

历史上曾被称为“南洋”的东南亚地区,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曾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抵达地,也是近代以来华侨支援中国反帝反殖斗争的海外后援地。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华侨华人,无论经历怎样的历史风雨与现实困境,总是顽强地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并在发展沿革中塑造出兼容民族性与跨文化性的特质。在世界视野中考察中华文化的存在状态与延展变迁,东南亚地区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枢纽点。

学界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认知,从资料的发现与开掘,到研究空间和理论方法的不断拓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历史的文化场域,东南亚华文文学依然展现出诱人的魅力,吸引着研究者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思考。可以说,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已然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镇之一。而在众多研究者中,“75后”的金进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扎实的史料梳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作为年轻学者,金进是勤奋且充满活力的。年轻使他充满锐气,而勤奋治学和对理论问题的敏锐感知,又使他的研究具有了史的厚重感和话语的前卫色彩。他师从复旦陈思和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受时为复旦大学长江学者的王德威教授学术影响,2007年博士毕业后,又曾在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国台湾东华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10年,多次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学,直至2016年回到祖国,转益多师是汝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学术道路令人羡慕。他的理论素养和文学情怀在《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这部专著中得到鲜明的呈现。他以华语文学“整体观”的视野,考察世界范围内华语文学与文化的传承转化问题;在“冷战”历史背景下梳理东南亚地区华语文学传承中华文化的谱系线索,并对史书美、王德威等研究者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内涵、理论变迁及局限进行评析。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学界以往讨论较多的话题是“国族认同”、“文化身份”和“本土意识”的纠葛等问题,这些已经被充分意识到的历史因素成为金进展开思考的基础,他尝试在

切近历史真实的过程中发现更多未曾揭示的“真相”,而“冷战”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和一种影响了世界格局的“思维意识”,成为他思考“认同困惑”与文学的跨境旅行之间关系的切入点,并由此将一些隐而不彰的历史细节呈现出来。

《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比较系统地讨论了“冷战”背景下“南来文人”“南下影人”对新马文化艺术的影响问题,勾勒了世界范畴内中华文化“复合互渗”的特征和历史轨迹。对“冷战”作为一种时代性因素在文化艺术与文学传播中的影响的评析,体现出著者文史并重的严谨治学态度,以史料的挖掘、整合与铺陈,梳理跨区域、跨时代、跨文化的华语文学创作历程,在文学与史实的对话中,形成极具包容性的个人史观。论著采取以“史”鉴“文”的研究方式,在文本、文人、期刊、社团等主体中辨析历史的痕迹,并在史料、史实的佐证下实现文学场域的复苏与回溯。其写作的策略,概略体现出如下特点:一是侧重于在历史的呼应下,寻找文本的生成机制。著者以回望历史的姿态,开始对新马华文文学以及台湾地区华文文学创作的解读。在梳理新马华文创作转变的过程中,始终暗含着一条精神路径,即是与历史演进轨迹相伴生的族裔认同,这条文学史脉络以典型历史事件为节点,以丰厚厚重的历史资料填充着文本诞生的缘起与文本价值的外延。于是,马来西亚本土抗日活动史料成为族裔认同叙事的素材来源,南洋华侨对美国、日本的抵制运动成为20世纪初海外民族情绪的载体,“冷战”格局的开启实为新马华文创作题材调整的催化剂……著者对史料的详尽掌握、审慎选择,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留下了真切可靠的历史侧写。二是借助文人的跨境流动,铺展群体的迁移史与民族的精神史。论著在对汉素音(韩素音)、温瑞安等“文人”的个体生命体验、创作经验加以考辨时,由“史”出发的文学批评理念,使著者大胆拓展个案研究的文学范畴。如对汉素音文学精神的呈现,并不局限于作品的解读,而是从笔名的演变意义、个人传记所传递的身份认同等个体经验史切入,进而以汉素音为原点,延伸出复杂的海外交流人际网络,以其在政、商、学三界的声望,奠定汉素音文化身份的特殊

性,为论述其左派倾向的具体表征营造出厚实的历史氛围感。三是关注“冷战”格局下东南亚文学刊物的历史生态。如果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和作为叙事动力的“历史”由来已久,那么“冷战”正是著者为观照台港地区及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寻找到的绝佳历史背景,这一世界时刻下的中国维度,在东南亚文学期刊中映射出种族与国家的话语冲突,凝结成辐射至今的历史爆发力。

相比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本土的资料整理工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资料的搜集、发掘方面有更多的困难,史料散佚、资源匮乏时常成为研究发展的瓶颈所在。因此,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在史料意识、史识建构等方面加以摸索,就成为确立研究者学术品质的关键因素。《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展示了丰富的新马华文文学史料,著者用详尽而丰富的史料,带来“冷战”时期台港及东南亚地区华文创作历史语境的复苏,并以文学研究实践对“华语语系”概念重新进行解读与建构,回应了前些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堪称热点的“华语语系”争鸣现象。由史书美提出,经王德威重新阐发和纠偏的“华语语系”阐述,近些年来在海内外学界引发了不少争论,争议虽然是由文化研究引发,但研究者思维方式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影响却值得反思。金进选择从对“冷战”思维惯性的思考入手,深入揭示不同国家地区研究者文化观念的差异。正如其在论著“序言”中所强调的:“我们重申华语语系的理论源头和批评方法,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学习和理解另外一种观看中国文学的方式,它可能不是一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理论,但绝对是一种片面而深刻的批评方式。”他在研究中不依赖单纯的理论推演,而能借助对文学史料的发掘铺陈,再现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创作实况与历史真实,并由此辨析“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粗疏讹误,取其“中国/周边”、“普通话/各种华语”等多元视角作为华文文学整体观的补充。其对“华语语系”概念的重新阐释,体现出中华文化内置的包容性,又于纷繁复杂的文学场域中,提炼出台港及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例如在考察早期马华

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时,论著打通马华文学左翼思潮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密切联系,中国近现代民族思潮随着知识分子的流动和信息的沟通,对马华社会产生冲击,触发了文学的激变,在域外彼时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形成关于文学、社会、哲学问题的热烈讨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同根同源而异域回应。而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地区对中国现代文学、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实现了华语创作的又一次共鸣。著者以典型案例细化着概念的内涵,也彰显了自身广阔开放的学术视野。

在《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史料与文本、理论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文化的跨境互动显得脉络清晰而又富有层次,在宏大叙事和作家个案的结合中,史料一定程度上弥补着文本内部研究的乏力,成为文化诗学的重要元素。

此外,论著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问题域的跨界生长”。著者在重建历史维度的探索中,既有对不同主体史料的借鉴与对照,也着意通过跨界创造新的问题域。其中,《冷战文化、青春书写与影像表现》《光影中的冷战——以1950、60年代星港两地电影互动为研究对象》《冷战文化、南下影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华人历史、国族认同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合谋》等篇章,侧重从影像与文本之间的裂隙出发,阐述中华文化传播与影视创作的关系,研究视域的拓展,跨界的思索与发现,为研究者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域外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信息。论著一方面关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电影、电视剧作品对华文文学的影视改编,另一方面关注“冷战”意识的渗透在不同主体间的差异化选择。影视改编过程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尊重或偏移,同样隐喻出历史意图的多样性,以及“文化中国”情结的日渐生成。与之相应的,是著者发觉了不同作家剧本创作心态的差异,张爱玲对编剧身份的认同,对编写演员的认知,使得文学创作中的苍凉风格过渡为剧本创作中的通俗言情面貌,与郭宝崑的左翼现实主义追求对比鲜明。而著者在选择剧作者人史时一视同仁,坚持以史料验证历史、解读文艺的研究路径,力争对“冷战”格局影响下的华语文艺



界做出中肯、客观的复原与评价。不同于单纯由艺术叙事出发的影视改编研究,《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的影视改编议题,仍旧是著者探寻历史的通道,甚至是著者着意发掘的史料本身,在探寻历史缝隙的同时也成为现当代史科学的一部分。也正因此,悉心收集的电影海报、细致整理的电影信息图表,均从历史的边缘一跃而成为时代标识,标识出影像叙事意图背后的话语权争夺。

“冷战”作为人类政治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曾经影响世界格局几十年,其对文化、政治、经济等的影响堪称巨大,不过,研究者对政治、经济的讨论很多,而对于文化的影响则长期被忽略了。尽管“冷战”已于20世纪90年代初宣告结束,但其思维惯性、精神留痕依稀可见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对“冷战”作为时代性因素在文化、文学发展中留下的印记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次以史为鉴的文学史梳理,一次冷静自持的回望,一次为了走出“冷战”意识的必要认知过程。王德威评价说:“作者梳理史料,细读文本、辩证个案,思考政治、教育、伦理与心理因缘,笔锋所至,道尽一个时代花飘零下的惶惑,以及灵根自植的寄托——文学与世变的多重关系因此有了新的表征。”诚然如此,探讨文学与世变的复杂关系,不仅寄托着研究者的历史情怀,更具有现实的文化建构意义。



徐风《忘记我》:

## 忘记她,何曾容易

□钱虹



70多年前发生在异国他乡的那段“拯救”历史,《忘记我》设置了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传主钱秀玲的成长与生活及其钱氏家族的史诗传记,另一条则是作者苦苦寻访传主传奇故事背后的史料支撑。这些史料包括史学家最重视的所用材料的可靠来源以及搜寻史料过程中爬梳剔抉、辨伪识真的功夫,注重使用第一手史料、原始档案、稀有文献等。作者查阅了大量档案手稿、解密文件、早期报刊等,尽可能通过信件、证词、当事人的回忆讲述等来还原历史的真相。作者赴比利时寻访,竟奇迹般地找到了当年传主“拯救”的惟一尚在人间、已103岁的“人质”幸存者莫瑞斯,他的亲口讲述,比任何曲折紧张的战争大片更形象动人。传主不顾自身安危跟着艾克兴地下抵抗组织领袖雷蒙,冒险驱车近200公里连夜从埃尔蒙村去舍佛堡“救人”的情节,哪是凭虚构就能令人信服的?从而无可辩驳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场景,也更凸显出传主是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情形下前去完成“救人”壮举的。作者还带领读者走进当年艾克兴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雷蒙之子家中,亲眼目睹那辆当年曾载着传主完成“救人”使命、如今已锈迹斑斑的老掉牙的雪佛兰车,这无疑成为“拯救”故事的最有力的历史物证。

除了传主“救人”事迹以外,还有哪些曾被历史遮蔽的史实与人物?以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语焉不详。尤其是遗漏了“拯救”环节中重要而又关键的人物——传主的堂兄钱卓伦将军。《忘记我》首度以翔实的史料生动地披露了这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二战期间助其堂妹在异国他乡挺身“救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没有他,传主不可能去找时任德军驻比利时最高军事与行政长官法肯豪森将军求情。正是这位曾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法肯豪森将军与钱卓伦将军结下的深厚情谊,



德国舍佛堡,二战时德军驻比利时军事与行政官邸,钱秀玲在这里见到法肯豪森将军,营救入质。

才使传主几度为即将被枪杀的人质求情变得可能。传主第一次救人,是为救助邻居捷潘神父的准女婿、破坏德军铁路线而即将被绞死的抵抗组织成员罗格,起初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丈夫,而是先去乡村邮局给万里之外的堂兄发电报,“她要卓伦哥哥尽最快的速度跟法肯豪森打招呼,刀下留人”。钱卓伦收到电报后,“他以一位将军的敏捷果敢,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他的朋友法肯豪森将军发了一封急电”。此后,钱秀玲赶往舍佛堡的简易行囊中带着“卓伦哥哥寄赠给她和葛利夏的签名照片”“卓伦哥哥涉及法肯豪森评价的亲笔信件”“钱卓伦和法肯豪森将军在五台山寺庙前的合影”等。她第一次之所以能见到法肯豪森将军,是“钱卓伦将军的名字起了作用”。此后几度拯救人质,都离不开钱卓伦将军这层关系。与其说是钱秀玲“救人”,不如说是钱氏兄妹戮力同心、共同拯救的结果。钱卓伦将军是不应被历史遮蔽的“救人”的大功臣。何况,他的儿子钱克显和儿媳王瑶君都是打入台湾情报系统的中共特工,上世纪50年代夫妻双双在台湾英勇就义,如今他们的墓碑就立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上。正如作者所述:“钱家的人,骨子深处都存放着祖先遗传的基因,那就是关键时刻的果断与果决,还有一份被温和平包裹着的刚烈。”

### 史诗兼备的文学表述

作为传记,《忘记我》的文学表述清晰生动,艺术感染力很强,以此还原与再现的历史场景非寻常笔墨可比。就叙述框架而言,此书采用了类似司马迁《史记》的笔法,史中有论,事出有据,论从史出,史诗兼备。传记文学的精彩在于史实与文采相互辉映,即史料考据与诗意书写之间的审美统一。作者很清楚:“忠于事实的文字,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不会撒谎,无论岁月更替,人事代谢。”

传主在二战期间究竟救了多少比利时人?这之前的不少文本中含糊其辞。《忘记我》中首次披露了被拯救的确切人数,有树立在艾克兴市博物馆前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为证,上面镌刻着:“钱秀玲女士总共拯救了110位人质的生命。”数字是历史的佐证,但毕竟刻板而抽象。纪念碑上冷冰冰的数字更具有人性温情与审美意义的是,作者竟找到了1945年7月21日在艾克兴市命名“钱秀玲路”落成典礼的珍贵视频与当天出版的《艾克兴周报》,其中登载着时任艾克兴市长的致辞和钱秀玲的答谢词。市长的致辞说:“当我们在这里集会,以比利时政府和艾克兴市人民的名义,为格里高利·佩尔吉夫人钱秀玲女士命名一条属于她的道路,以表达我们对她的敬仰和纪念。她以超凡的勇气拯救了我们110位反战士兵以及无辜民众,她的卓越品格必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坐标。此时此刻,我们通常使用的向来以其丰富词汇著称的法语,突然变得如此苍白和贫乏。是的,我们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她——佩尔吉夫人钱秀玲女士的崇敬之情。”赞扬之词中的数字已经化为“救人”的崇高与温暖,无法用任何语言来表达的敬仰与感激。

而传主的答谢词堪称是一篇充满激情与诗意的人道主义宣言书,它更令人动容:“今日重返艾克兴,向这座城市的入质、牺牲者献上敬意,我倍感宽慰;大约一年多前见到他们时,心情是十分沉重的。能够向这座城市友好的人民,尤其是向饱受德军罪行之苦的人们献上敬意,我感到十分荣幸;我与诸位一道,向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而倒下的英雄们致敬。”说到这里去“为无辜的人质求情时,我意识到我是在为那些被最可怕的独裁者即将夺走不幸生命而抗争,我完成了这项伟大的任务。如果说,这些宝贵的生命因此而得救,那么我也获得了奖赏:我虽无这样的预期,但确实感到了一种少有而温情的满足,因为我为履行了一项神圣的义务。自我踏上比利时这片国土,我便一直欣赏并钦佩你们的美好品质,你们的热情和诚恳,让我不知不觉地加入你们的行列之中。”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中国女性的风范:明明是如同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式善举,却诚恳地和比利时人民一道,“向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而倒下的英雄们致敬”;明明是比利时人请求她出面解救入质,她却说自己“是履行了一项神圣的义务”,并且是“你们的热情和诚恳,让我不知不觉地加入你们的行列之中。”由“救人”而变成了彼此钦佩,互相给予,共同拯救。这就把宗教式“救世”的怜悯之心,化成了中国人的善良、慈悲与仗义行侠的美丽形象。

钱秀玲无疑是身处异国他乡的一张中国人的美丽名片。正如作者所言:“钱秀玲的事迹,放在全世界的背景下,都是叹为观止的。”虽然她晚年多次说“请忘记我”,但既然她已经走进了那段难忘的历史,要忘记她,何曾容易?

### 书写真实的“英雄”

传记文学是运用除了虚构以外的多种文学手法,再现人物生平经历与事迹,刻画其鲜明形象和生动个性的文学体裁。它属于史学与文学相互交叉的范畴,其独特价值在于虽然叙述人物或事件,却不能天马行空任凭想象地虚构故事情节,即属于非虚构性文体。《忘记我》在历史的真实性与细节的丰富性上,做了合乎史实的还原与再现。

作品的女主人公钱秀玲已为人所知晓。她在二战期间,身处被德军侵占下的比利时,从德国盖世太保枪口下营救100多名比利时青年的性命。战后,她被誉为“中国女辛德勒”和“比利时的中国母亲”,受到比利时人民的敬仰和尊崇。为表彰她的义举,战后比利时政府向她亲授“国家英雄”勋章与绶带,她在战时曾救下多名市民的艾克兴市将该市的一条道路命名为“钱夫人路”。上世纪90年代末,钱秀玲的传奇故事随着媒体的报道逐渐为国人所知,以她的事迹为蓝本的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6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2002年在央视播出后,反响强烈。此后《人民日报》曾多次报道钱秀玲在二战时的英勇事迹。

要为这样一位众所周知的“英雄”立传,任何一处史实的虚构或失真都将是具有崇高声望的传主的亵渎与不敬。读者希望看到的应该是那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不施粉黛、血肉丰满的真人。传主去比利时留学的“前传”,她为何“悔婚”,获得鲁汶大学双博士学位后如何随夫居留偏僻乡间诊所谋生,战时她究竟是怎样营救入质的等等,皆是无法绕开的史实。《忘记我》的作者还在还原历史的真实性方面,主要通过大量丰富的细节来加以展示。比如,钱秀玲童年时在宜兴老家“钱家祠堂”跟着乡村塾师念书,小小年纪竟能一字不落地熟背《前



春日访友图 李锐之作